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

——中华传统道德操守的底线思维

□ 梅敬忠

在传统中国社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始终是精神命脉。这组关键词，素有“八德”之称，凝练着中华传统道德操守的精髓。它比起人所熟知的“三纲五常”主流价值观，更具有坚实的民间性、广泛的传承性和深远的影响力，堪称是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人广泛地将其视为立世的行为准则和底线思维。

八德之本：孝悌忠信，内化于心

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诸如“五常”之仁义礼智信，“四德”之忠孝节义，“四维”之礼义廉耻，等等，早已与传统治国理政之道融为一体。所谓仁政德治，伦理教化，以礼入法，须臾不可乖离这些德目。八德之称，向来众说纷纭。孙中山先生主张“孝忠仁爱信义和平”，称其为“中国固有的道德”，此论最为著名。但以今之论，概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之称，最能阐释传统道德操守的真切涵蕴，最可透视传统道德观念家国同构的实践理性特质。

孝悌忠信，层层递进，其要害在忠孝之道，属于道德自觉的内化于心层面。孝，意即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祖先，乃为纵向而论。悌，亦作弟，意指兄弟和睦，属横向而言。“孝悌”二字，常常作为传统伦理规范之基石，一体使用。所以《论语·学而》篇云：“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弟子规》亦讲“首孝悌”。在儒家看来，百善孝为先，孝乃人伦之本，道德之源，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抓住了孝悌这个根本理念，使其深入人心，培根固本，则其他德目的推进，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经》的观点更加明确：“人之行莫大于孝”“而罪莫大于不孝”。古代刑法有“十恶不赦”之罪名，不孝之罪，正在其中。

由此看来，治国理政，也须首重孝治，以孝道为先。甚至可以说，家国同构，中国传统文化即是以孝为根本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也是以孝为

基础的社会。黑格尔考察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密切交融特性，认为“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忠，本意是指诚实无欺，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忠贞不贰，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尽己之心为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家国同构，国即大家，忠是孝的延伸和扩展，不过是更高意义上的孝。《孝经》有“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一般而言，如果说孝道主要是覆盖家庭孝敬层面，那么，忠德则是广泛涉及社会交往与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是履行公职行为规范的心理依据。但正如家国一体，君子当有家国情怀；忠孝本为一体，其实难分。对君（国）尽忠，即是在家尽孝的延伸；当忠孝难以两全之时，公忠体国，移孝为忠，乃至尽忠报国，则最为优先。岳飞精忠报国事迹，千秋赞誉，即是典范。

古人对忠德屡有誉词，诸如忠诚、忠信、忠厚、忠实、忠恕，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忠诚老实，成为最为社会共识的美德、最为人们欣赏的君子品格。至于信，本意为诚实守信，简称诚信；有时与忠相连成为忠信，有时与义相连成为信义，有时称之为信任。视其为忠德的延展也未为不可。所谓一诺千金之说，只是其突出表现而已。孝悌忠信，忠孝为本，关键在于内化于心，非是外在规范的强制。

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外化于行

礼义廉耻，乃是传统中国一直突出宣扬的四种伦理规范。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官民一体遵循，社会赖以生存。是为人们外化于行理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国家政权赖以巩固的伦理支柱。所以称为四纲，也叫四维。

管子认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甚至细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

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的礼，说的是上下有节；有礼，人们就不会僭越等级规矩。义，相宜合适也，是指按法则规矩行事，不妄自求进取，则民无巧诈之机。廉，是指廉正公平，明察善恶，不掩饰恶行，身正行端。耻，则指有羞耻之心，就不会顺从邪妄，做不正之事。礼义廉耻，“均为治国之本”。其实，孔子对此卓有深见：“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则将四维一分为二，认为：“礼义，治人之道；廉耻，立人之道”。是说以礼义规矩之大法则，约束人的行为；甚而“知耻近乎勇”，激发人们的廉耻之心，勇于追求自新，高尚节操，立世扬名。其实，礼义廉耻之四维，皆为相互关联不可截然分开的德目，都是在助力强化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约束力，将孝悌忠信的内在德性生发开来，又用礼义廉耻外化于行的伦理规范去约束人们的邪思妄念。

礼义廉耻四维之中，礼最为要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建设，有礼仪、礼制、礼法、礼治、礼乐文明之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为人处世之道，又是一种影响广泛渗透深切的礼仪规矩意识、处世态度。《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经》谴责道：“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即是说，人不讲礼仪，不知其可也。知书达礼，乃君子之品。

显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不绝如缕的礼仪文化，早已从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传播浸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中的基因了。所谓礼仪之邦之说，包括尊老爱幼、好客之道、先礼后兵、礼让三先等践履之举，是事实描述，也是价值判断，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

自律他律：公忠体国，礼为德则

继承中华传统道德精髓，需要秉

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立场，科学看待其传统伦理思想与规范。首先要礼敬中华文化，抽象继承其合理内核，再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新生活需求。比如倡导“忠孝为本”时，应清除其落后思想，摒弃其“愚忠愚孝”之糟粕，汲取其孝敬父母、礼敬先贤、慎终追远、纯洁心灵的精神追求。

传统道德教化经典皆辟有专章，主张臣子应该主动纠正君父的错误，以免陷君父于不义；认为此举乃为大忠大孝。所谓“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违而不谏，则非忠臣”“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当不义，则爭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明确反对“愚忠愚孝”。南宋吴自牧谈到皮影戏的政治特色，认为是“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行，盖亦寓褒贬于其间尔”。所以，忠乃“公忠”，公忠体国，乃为大忠。

礼者理也，德之则也。自周公制礼作乐而后，礼之地位，雄踞于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观念之神圣殿堂，有“天经地义”之论。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为德则，礼本身就是根据传统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所以才有“以礼入法”之说。因此，重视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礼文化建设的经验，必定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顺理成章地走向法治化。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的民族的“根”与“魂”，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助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独特的战略资源。法是他律，德是自律。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更应该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相结合起来，自觉去唤醒中国文化中涵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同时赋予其新时代的灵感。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重修身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修身根本上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梁启超先生说：“儒家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那么，修身要达成什么样的境界呢？或者说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包含什么样的品格特质呢？

光明磊落、豁达淳朴。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心地平坦宽广，思想上坦率洁净，外貌动作也显得十分舒畅安定；小人心里欲念太多，心理负担很重，常常忧心忡忡，因此外貌、动作也显得忐忑不安，一副坐卧不宁的样子。君子之所以能安详舒泰，是因为他心胸豁达，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不猜疑，不抱怨，不嘀咕，内心宁静；还因为他大度包容，能忍受委屈，即使别人暂时不了解自己也不生气。“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人不知而不愠”。他敢于坚持正义与原则，敢说真话，敢作敢当，不虚与委蛇。

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儒家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奉献在先，获取在后。“事君，敬其事而后食其食”。孔子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泊，“子罕言利”。他不喜欢那些一味注重吃喝玩乐的人，认为他们不是求道求仁、有担当有责任的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对那些生活俭朴但又志向不改、乐在其中的人，孔子总是由衷地尊敬，即使是自己的弟子，也不吝赞美之词。“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儒家文化具有积极入世的特点，特别强调责任与使命，主张为社稷民生作贡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生生不息，每时每刻都在向前运行发展，从来不会停下脚步，君子也一样，永远不要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大地胸怀阔大，无所不包，兼容万物，君子应如大地般心胸宽广，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孔子曾对弟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政治主张行不通，他便转而开办学校教授学生，在他们门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他晚年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古籍，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时人评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孔子认为士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而不应目光短浅，只是满足于吃饱喝足、无所作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勇于付出、踏实肯干，不知疲倦、永不懈怠。因为主张实干，所以孔子不喜欢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说到做不到。更有甚者，这样的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浮夸少德。他提倡少说多做，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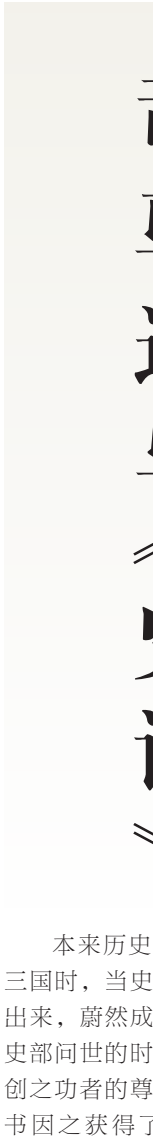
儒家修身要达成的境界

□ 张文珍

为“刚毅木讷近仁”，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从容坦荡，安祥稳重。儒家要求人应该具备一种好的性情气质，温文尔雅，恬静自然。“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的性情应该温和圆润，宽厚包容，而不是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不重则不威”，言行要大方得体，庄重威严。孔子就是一个性情温和、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子贡评价老师：“夫子温、良、恭、俭、让。”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也是一派悠柔和悦的姿态：“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他很少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却让人感到一种严谨威严的气势和风度：“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修身对内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慎其独”。《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正因为君子重修身，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便拥有了高贵的品格，让人尊重，让人敬服，且具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威严，就像荀子所言，“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

 **司马迁与《史记》**

□ 陈晓华

本来历史的记载通称史记，但在三国时，当史书从六艺的春秋类独立出来，蔚然成类，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史部问世的时候，出于对史书做出开创之功者的尊崇，司马迁所撰写的史书因之获得了《史记》的专名。从

此，史书不复有史记的通称。而司马迁史书的本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反而湮没无闻。

司马迁的幸与不幸

历史有情，记忆下司马迁的贡献，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就此而言，司马迁是幸运的。当然，司马迁的幸运并不只在于其身后，在没有身陷李陵事件之时，他也可谓上天眷顾的宠儿。出身史官世家，欣逢盛世，能优游探访大江南北，亲聆故老耆旧言论，网罗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人事迹，考察成败兴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国等请教学问，识今文古文之旨；能亲闻樊哙之孙谈汉初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能亲见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日后他为之辩护的李陵同朝为官；能继承父业，得以窥金匱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来者的雄心壮志。平生唯恐辜负先人，不小心成了“靡先人之言”的罪人。命运无情，他后来确实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负先人的罪人，而是汉武帝的罪人。不负先人反倒是他生存于世的最大精神支柱。

不过，古往今来，能得上天眷顾终始的，难有几人，所以司马迁的幸运到为李陵辩护时就告止了。因此，司马迁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种矛盾斗争在加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堕入漩涡。同时，这个时候的史官已不复有盛时巫史合一的至上荣光。对司

马迁来讲，更糟的是，为素无往来的李陵辩护，使他卷入了朝堂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触忤了盛世君王汉武帝，自己却无钱以赎，落得个接受腐刑的结局，从此格上最耻辱的印记，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然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始终是儒家的崇高理想，“立德，立功，立言”向来就是井然有序的士人遵奉的三不朽。此三不朽，立言最次，似乎容易，却实为最难。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传之后世，必然有功。但这立言却最易祸己。在了却生命还是继续生存的两难下，司马迁义无反顾决绝地选择了以“立言”来延续自己本该放弃的生命，因为人虽然最终都会回归尘土，但终究是有鸿毛泰山之别的。这正如管仲不死，其不死之效功在千秋——助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免于国灭、民风民俗改变的命运，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余泽。为此，他呐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并付诸实践。探讨天道人事，古今中外，兴衰成败。成一家之言，于是成为《史记》的终极追求，融入了司马迁的爱恨情仇。

成一家之言

于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吕后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先

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叙述货殖崇拜势力而以贫贱为羞，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项羽虽然失败，却不失为英雄。吕后虽然没有公然称帝，却是实际的统治者。陈涉虽然出身农民，但首举义旗率先称王，孔子八世孙孔鲋都乐意为他所用。为他们立本纪、世家，确实符合实际。成一家之言之誉，司马迁实当之无愧。而纪传体体裁为司马迁首创，且历2000年为各正史承袭而不断，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现。即使不用具体例者，也对其甚是嘉赞。

不过，成一家之言并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一部《史记》便是司马迁对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气，但死不难，如何处理死倒是最难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韩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敌也是勇敢的。所以，司马迁自己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没有选择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司马迁死和生的界定标准。他要勇敢面对人生，完成父亲的重托，成就一家之言。这是先人的事业，家族的事业，乃至天下的事业。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贡献与不朽来论定的，并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中了。

故而，李陵败降，他认为忍辱待时报效汉室。因此，当汉武帝就李陵败降一事垂询于他时，他竟然说出了这骇人听闻、有伤汉武帝雅听的、给自己带来天大祸患的见解，而这个李陵和他并不是私交好友。故而，周

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作《离骚》，这些身处逆境而坚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赞扬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与榜样。不过，这里面当然也不免有司马迁愤世嫉俗的一面。

至于那些为正义、为理想、为国家奋斗抗争的人物——晋文公流亡19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苏秦以锥刺股苦学，先国家后个人的蔺相如、刺秦秦王的荆轲、自荐出使楚国解国难民危的毛遂、震慑匈奴却一生不得封侯最后愤而自杀的李广等，这些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灵魂也是司马迁笔之所爱，这些人不屈不挠壮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马迁以凛然之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史记》中。同时，司马迁也给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间。项羽别虞姬是美的，他不过江东也不失为壮举。项羽最失意之战，正是司马迁最得意之笔，不无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

良史之责史家直笔

由此，揭露统治者的丑陋，抨击时弊劣政，痛斥贪官污吏，也成为司马迁的职责。他讥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并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宫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马迁依循的是良史之责，遵循的是史家直笔。所以他对《禹本纪》《山海经》所记怪物，不敢轻言。当然，《禹本纪》《山海经》自

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土壤，它们是当时先民对世界朴实认知在文字上的反馈。自孔孟以来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统观已然形成，司马迁其表看似偏离，但其本与时代并无二致，否则正史不会以他的《史记》为宗，列之第一，所以司马迁必然如孔子一样不诤怪力乱神。

一部《史记》，有学者称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当然，《史记》并非尽善尽美，司马迁的天命观是非常浓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际”，是与“天人感应”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天会垂象，秦并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运当然也是天注定的。所以他要认命，仍一如既往地心甘情愿货与汉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又非常纠结，于是他把自己的种种纠结写入了书中。

大地无言，山川静默。当年司马迁在如屈原般悲愤凄惨的境地下，以执着的史笔，以优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记》，未来的岁月则渐次赋予并加深了它的底蕴，给予了它永恒的历史命脉，使它成为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依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之作结，无疑最得其真，尽揭其神。

